

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初探

侯德础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留学生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序曲中思想解放的先声。这一运动的发轫，可以追溯到1912年李石曾、吴玉章等“拟振苦学之风，广辟留欧学界”而发起留法俭学会，但直到五四前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才如狂飙突起，蔚为时尚，吸引着一代中国青年的精英。从1919年3月到1920年底，国内就先后有20批1,600多莘莘学子远涉重洋，赴法求学。据周恩来在法国的调查，当时旅法勤工俭学者共1,579人。其中四川学生勤工者352人，俭学者26人，合计378人，超过湖南的346人居各省之冠^①。这一统计使我们在考察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之际，不能不对四川青年的留法勤工俭学特别充满兴趣。倘若再注意到，不少叱咤中国革命风云的人物，如吴玉章、陈毅、聂荣臻、赵世炎、刘伯坚、邓小平、萧朴生、傅钟、冉钧、杨伯恺、李大章等，都曾是川省留法勤工俭学之佼佼者，那么对这些巴山蜀水的前驱者们寻求真理的道路进行回顾和思索，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一)

近代中国兴起的留学生运动，除却早期自发向海外游学的涓涓细流，系以清季同光之交容闳受命成批携幼童赴美为滥觞。自光绪初，李鸿章等又陆续向德、英、法派出陆海军留学生。这是洋务派主持的军事留学时期，以沐浴美雨欧风为特点。甲午战败后，中国人对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跻身列强感到震惊，产生了效法日本富国强兵的强烈愿望。1898年，维新派人士杨深秀即力主向日本派遣学生，强调“中华欲游学易成，必自日本始。”^②以后吴玉章也追忆自己浮槎东渡时“好像是唐僧取经一样，怀着圣洁而严肃的心情”，“总觉得中国应该学习日本，走明治维新那样的道路”^③。此种心态加上留日较欧美路途近、费用省，中日文字、风俗相近诸因素，使留日热潮自本世纪初叶到辛亥革命，一直风靡全国，久盛不衰。

这种情况到五四运动前后有了明显变化。一方面，由于民元以来日本支持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把“二十一条”强加给中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侵略山东，中国的反日浪潮日益高涨，日本在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中国青年眼中已失去昔日光彩。另一方面，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深入人心，法国作为“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故乡，自然成为进步青年心中的楷模。《新青年》曾经这样公开介绍正在兴起的留法勤工俭学

运动之宗旨：“实欲将欧洲近世文明之‘科学真理’、‘人道主义’二大要素输入本国。”^④这等于宣布赴法勤工俭学是实践“民主”与“科学”理想的重要途径。更重要的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随之而起的欧洲革命风雷，使先进的中国人萌生了“以俄为师”的强烈愿望，而当时留学苏俄毕竟难以实现，于是大批有志青年便把目光转向了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均悠长灿烂，战后劳力奇缺，较易勤工俭学的法国。

下面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高潮中全国和四川学生赴法人数的一个不完全统计：（表在94页）

从表中不难发现，川籍学生大批赴法，基本上集中在五四运动后，这与全国总的趋势一样。在20批旅法学生中，除第二、三、四、八等批没有四川学生，第十二批情况不详外，其余15批批次不乏巴蜀儿女，而且第五、第二十批川籍青年居绝大多数，第十七批84位竟全是川人。这种情况为全国独有。总计20批赴法共1,559人，四川约380人，将近占1/4。若再加上零星去法者，到1921年11月，据巴黎华法教育会有名在册的统计，四川留法勤工俭学生已达492人，约占全国总数的1/3弱^⑤。考虑到在全国和四川派出留日学生均属最多的1906年，四川也仅占全国的1/10^⑥。应当承认，一向闭塞落后的内地省份四川，不但充当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主力，而且也在走向世界的问题上大进了一步。还应注意到，川籍学生中人才济济，全国瞩目。他们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的巨大作用，下文将作择要论及。

（二）

僻处西南腹地，风气一向闭塞的四川，何以成为留法勤工俭学人数最多的省份？

首先，四川是留法勤工俭学的肇始地之一。早在1912年初，当留法俭学会在北京成立之际，在15位发起人中，川人就有吴玉章、朱芾煌、黄复生、赵铁桥4位。同年6月，吴玉章又和朱芾煌、沈与白、黄复生、赵铁桥、刘天佑等发起四川俭学会，并在成都少城济川公学开设留法预备学校，这在全国也属开风气之先。吴玉章作为留法俭学会的首倡者之一，在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也和朱芾煌等加入了留法俭学的行列。他入巴黎法科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同时关切在法华工的教育，曾积极支持华工李广安等在“勤于工作，俭以求学”的口号下组织勤工俭学会。1916年，他又和中华法知名人士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成为该会的中方会计。年底，他与中方会长蔡元培联袂回国，先赴昆明同滇督唐继尧筹商发展华法教育会，未果，便于翌年春到北京，与华林等重建了留法预备学校，“同时又给四川同事去信请他们成立留法勤工俭学分会。”正是在吴玉章的直接推动下，留法勤工俭学会四川分会在蓉成立。该会在成都爵板街志诚法政学校内内设一班，即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第一届，招考陈毅等80名学生，开设法语、政务、财政等课程，准备两年毕业后派往法国留学。该校第二届于1919年秋季录取200多人，以后赴法者有萧朴生、穆清、程秉渊（子健）、黄映湖（里州）等。在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教育局长温少鹤及社会名流黄复生、朱芾煌等也筹集经费在夫子池开设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1919年暑期招生百余，日后旅法者有邓希贤（小平）、周钦岳、冉钧等人^⑦。可以说川省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兴起，实与吴玉章的鼎力提倡、赞助、组织密切相关。他以老同盟会员、辛亥荣县独立和内江起义的领导者、孙中山亲密同志的身份，为青年留法不遗余力，因而在四川学子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这是那些借提倡留法勤工俭学沽名钓誉的投机分子，诸如吴稚晖、张继、汪精卫等望尘莫及的。尤可贵的

从上海 起程日期	船 名	总人数	四川学生人数	抵法时间	备 注
1919·3·17	因幡丸(日)	89	喻正衡、黎纯一、王良翰、石琮、杨洵(伯恺)等9人	5·10 抵巴黎	徐悲鸿此批赴法
3·31	贺茂丸(日)	26	无	5·20抵巴黎	经英国转法
4·13	伊豫丸(日)	2	无	6·6抵巴黎	经英国转法
7·13	三岛丸(日)	58	无	9·2抵巴黎	经英国转法
8·14	Manam 麦浪号	70余人	陈毅、陈炎、李嘉秀、周泽厚、林万选、苏言川等61人	10·10 抵马赛	
8·25	Andrelepon 盎特莱蓬号	54	曾琦、胡方猷等5、6人	10·1抵马赛	钱昌照、任光 此批赴法
9·28	Porthos 博尔多斯号	19	李劫人、胡助、王仲怀等10余人	11·12抵马赛	徐特立此批赴法
10·16	Wollowra 渥隆号(美)	48	无	11·25抵马赛	
10·31	Paul Lecat 宝勒笱号	162	周钦岳、吴震寰、熊天祉、邓租芳等10人	12·7抵马赛	李维汉、李富春、张昆弟、贺果等此批赴法
11·22	Rhesus 勒苏斯号(英)	40	胡平成1人	1920·1 抵巴黎	贵州黄齐生、张道藩此批赴法
12·9	Sphinx 司芬克斯号	158	聂荣臻、钟汝梅、黎重夫、帅立本、汪域周等54人	1920·1·14 抵马赛	颜昌颐及湘女生范新顺等4人此批赴法
12·25	盎特莱蓬号	50余人	不详	1·28抵马赛	葛健豪、蔡畅、向警予等6名湘省女生此批赴法
1920·2·15	博尔多斯号	52	确数不详,至少2人以上	3·25抵马赛	许楚僧(德王行)此批赴法

从上海 起程日期	船 名	总人数	四川学生人数	抵法时间	备 注
4·1	宝勒笱号	50	王光祈、魏时珍、沈超、李鹤龄等15—16人	5·7抵马赛	王、魏2人很快转赴德国
5·9	Armand Behic 阿尔芒勃西号	126	琴荪(赵世炎)、罗成鎔及女生王曜群、胡蜀美、吴若膺等共13人	6·15抵马赛	肖子暲、张天翼此批赴法
6·25	博尔多斯号	97	刘伯坚、蒲照魂、杨昌祚等, 确数不详, 但在7人以上	8·4抵马赛	
9·11	盎特莱蓬号	84	全为四川学生, 有贷费生冉钧、江克明等46人和自费生邓希贤(小平)等38人	10月下旬 抵马赛	
11·7	博尔多斯号	197	傅钟、左绍先、李霏、杨槭、熊天锡等13人	12·13 抵马赛	周恩来、郭隆真等此批赴法
11·24	Cordillere 高尔地埃号	23	女生张雅南、石海霞、潘惠椿、李鸿明、朱一恂、朱一逊、张振华等8人	12·27 抵马赛	张申府、刘清扬此批赴法
12·15	Chili 智利号	144	李畅英(大章)、萧树槭(朴生)、穆清等92名男生及女生胡慕昭、常澧涓	1921·1·20 抵马赛	有朝鲜籍学生16人

注: 1. 未注明国别的, 都是法国轮船。

2. 资料来源: 《时事新报》1919·3·5; 3·29—31; 10·22; 12·1; 1920·6·26; 9·14; 12·15。《国民日报》1919·4·14; 8·9; 10·31; 11·1—3; 12·9—10; 1920·11·7; 11·25。《时报》1919·7·7; 1920·11·19。《上海晚报》1919·10·14—15; 11·15。《申报》1919·12·26—28; 《新申报》1920·3·28。《晨报》1920·5·21。《工读》第三期; 《学生杂志》七卷三、四号; 《国民》二卷三号; 张允侯等编《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一)812页附表; 《四川近现代人物传》一、二辑。《旅欧周刊》十二号。

是，吴玉章在推动留法勤工俭学时，坚持追求真理，让思想合于世界新潮流。最初，他赞成留法的宗旨：“欲输入世界文明于国内”，“欲造成新社会新国民”^⑮。1917年5月，他在北京预备学校开学典礼上又提出，旅法勤工俭学的目的“一曰‘扩张国民教育’；二曰‘输入世界文明’；三曰‘阐扬先儒哲理’；四曰‘发达国民经济’。”^⑯显然，这些都未超出“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范畴，仍不脱资产阶级留学运动的窠臼。然而十月革命后，1920年1月，正值留法运动高潮，吴玉章在对四川留法预备学校演讲时，却意味深长地嘱咐：“俄国革命进步最快，是因为俄国有新党主政。俄国党人无不曾历法国。吾人欲察其发动之源，不可不一往考查。诸君遇着这举世混浊之时，新潮汹涌之会，不可不勇往直前，造最新的时势。”^⑰吴玉章思想的这些变化，无疑给他倡导的留法勤工俭学注入了崭新的内容。对于渴求真理、新潮，希望变革、进步的有志青年来说，这种启迪应当是勇往直前的巨大动力。以后四川旅法学生中走上共产主义革命道路者甚众，可否由此发现一点端倪？

其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之际，也正是川乱方殷，哀鸿遍野之时。四川自民元以来即兵连祸结，几无宁日。1916年初，川南叙（府）、泸（州）、纳（溪）、綦（江）成为护国战争最激烈的战场。而后1917年有川军刘存厚与滇军罗佩金、黔军戴戡的成都巷战，有川滇军的资（阳）眉（山）大战和资（阳）内（江）争夺战。同年秋冬到1918年2月底，还有滇督唐继尧借“护法”之名图川的“靖国之役”。1920年5至10月，围绕“倒熊”（克武）和“驱唐”（继尧），川滇黔军阀再度大规模混战。“战事从川东到川北，又从川西到川南，整个四川都是烽火弥天”。这种全国罕见的长期兵燹，不但使川境经济凋蔽、生灵涂炭，也使得教育残破，学子离散。而那些战乱中尚存的学校，多数也弥漫着封建守旧的气氛。吴玉章对四川学生演讲时，曾痛切地喊出：“国内无良学校，可痛！国内无干净土，尤可痛！”“与其死于沟壑，毋宁往法作极苦之工”^⑱。这些话反映了当时不少四川青年的心声。60多年后，聂荣臻在回顾自己留法勤工俭学的初衷时说：“所有这些发生在我中学时期的兵连祸结的事情，都使我感到苦恼，……出路何在？我当时只是把希望寄托在出国去学点本事，回来办好工业，使国家富强了，也许能改变这种局面。军阀混战造成国家贫困落后，更增强了我对‘工业救国论’的信念。这是我决心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另一方面的原因，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原因。”^⑲窃以为对于在军阀混战和封建专制下受苦至深的四川青年而言，此种想法应是极有代表性的。

其三，对留法勤工俭学起过促进作用的“工读”思想，在川籍青年中广为流行。所谓“工读主义”，是五四时期在“劳工神圣”的呼声中发端于知识青年的一种流行思潮。当时青年们为挣脱封建家庭的桎梏，为和传统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旧观念决裂，多以“工读”为存身进取之道。甚至有不少人主张按自愿原则组织“工读互助团”，过半工半读的集体生活，“人人工作，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幻想以此作为“新社会的胎儿”，进行“和平的经济革命”^⑳。这是具有五四时代特点的中国式的空想社会主义，自然绝难实现。但是，这种思潮在客观上却鼓励了青年不缠绵于桑梓故土，而勇于向外省外国的新天地开拓探索的热情和勇气。这一思潮的鼓吹者和实行者，以四川的王光祈为最活跃。他不但在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支持下发起了全国成立最早，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北京“工读互助团”，而且和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等在报刊上热烈讨论“工读”问

题，还与陈独秀、毛泽东等为发起上海“工读互助团”而募捐。王光祈还是著名的“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者和主持者。他对“工读”的提倡及“少年中国学会”的“奋斗、实践、坚忍、俭朴”的信条，在川籍学生中有很深的影响。象刘伯庄（坚？）、蒲照魂、杨昌祚等青年，曾组成北京“工读互助团”第四组，不久便都投身于留法勤工俭学的潮流。年轻的赵世炎也是“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和“工读”的积极拥护者。1919年10月，他和川省同学将“北京法文馆四川预备留法学生团”更名为旨在“联络乡谊，砥砺学行”的“北京高等法文专修馆四川同乡会”。该会为“研究工读的价值，讨论工读的实行”，又于同年12月初创办了《工读》半月刊，由赵世炎亲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工读》自问世到次年4月被京师警厅封禁，一共只出了6期，但却以大量篇幅研讨了勤工俭学问题。象第一期的《勤工俭学之个人与社会》、《定要男子才可以勤工俭学吗？》，第三期的《女子工读问题》，第四期的《“勤工俭学”观念上的根本错误》等，都集中反映了当时勤工俭学生赴法前的普遍认识，解决了一些迫切的思想问题。《工读》还辟有“法国通信”、“巴黎通信”等专栏，连载王良翰、杨洵（伯恺）、刘一、石琮等先期旅法川生的来信，详尽介绍在法做工、求学及生活的经验，供后继者借鉴。《工读》对青年影响极大，以致天津警察厅长也要罗织罪名咨请查禁。它对于团结在它周围的四川同乡的影响，应当是不言而喻的。

另外，当时四川地方当局和要人名流对留法勤工俭学也多抱支持态度。例如1919年春，当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第一届毕业生结业前夕，由南方军政府任命的四川督军熊克武、省长杨庶堪即指示：“凡经毕业考试名列前30名者，由政府给每人旅费津贴400元，以资鼓励”^⑤。而北京政府委任的四川省长张澜先生其时正在北京，也应吴玉章等人请求，同教育总长联名商请交通部支拨所存川汉铁路股款利息，藉以资助四川赴法学生陈毅等200余人的旅费。对在京暂时未能去法的学生，张澜先生又与蔡元培等磋商，许其在北大旁听。他还为生活困难者蒲照魂等代募经费，助其在北大附近开“食劳轩”饭馆以工助学。并亲为川生李霏、杨械赴法写介绍信，力为保荐^⑥。1920年4月，当吴玉章等会同法国驻蓉总领事白达发起四川华法教育分会时，熊克武、杨庶堪、但懋辛、刘成勋、吕超、刘湘等军政要人都是“名誉赞助员”。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亦曾为聂荣臻等10余位江津学生代办出国护照^⑦。对四川军绅名流支持留法勤工俭学的复杂原因，本文姑不予以考究，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赞助”毕竟比漠视和反对好，毕竟有利于四川学子到法国勤工俭学。

（三）

和各省留法勤工俭学生一样，四川学生抵法国后，或入学校，或进工厂，或候工待读。据不完全统计，他们在法国各地就读的学校共二、三十所，其中以入蒙塔尔纪、枫丹白露、圣日曼、沙多居里、木梦、麦梦、德洛和阿尼尔等公学者人数较多。如在阿尼尔习法文的中国学生共50人，四川就占了32人^⑧。以后转入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的川籍学生也为数不少。四川学生所进工厂也有好几十处，其中人数稍集中的是：巴黎圣端门外史来德机器制造分厂，有陈毅、陈炎、李嘉秀（季伟）等20余人；克鲁邹史来德工厂，先后有赵世炎、陈毅、萧朴生、程子健、傅钟、邓小平、聂荣臻等数十人；蒙达尔橡胶厂，仅江津学生就有聂荣臻、钟汝梅等十几人，邓小平也曾来此做工；巴黎独鲁云母厂，有邬光寿、李嘉秀等30余

人，占该厂勤工学生的3/5。此外，拉荷涉化工厂、圣夏门炼钢厂、雷诺汽车厂、列夫来威铁厂、格鲁皮朗工厂、沙里耳公司日光灯管厂和北法之哈佛尔机器厂，也都有数量不等的四川学子洒下热汗^①。当时，法国战争创伤未愈，百业萧条，军人复员又造成谋职困难，旅法川生大抵只能干粗笨脏累的工作，一日苦力，至多获十三、四法郎，一般八、九法郎。而一日生活费最少得五、六法郎。所以靠勤工来俭学并非易事。何况“每日在工厂苦苦作工八小时，身体精神均甚疲倦，余力修学，实属难能”^②。他们失业和换厂亦颇频繁。如聂荣臻就“在法国进过许多家工厂”，曾在橡胶厂“负责检查轮胎”，还到克鲁邹“炼过焦”，干过钳工和车工^③。不少觅职不获的同学，只好去往昔战场做埋尸、搬运弹片破铁、清理垃圾、运煤等苦工。在勤工的艰辛中，四川学生安子初在化工厂因砷液中毒丧命，在克鲁邹的南充同学赖庆麟、杨昌祚、范崇恒、邓正利等4人又因拮野菜误食毒菌而亡。残酷的现实，把许多青年万里旅法的美好憧憬打得粉碎，他们开始透过“民主”、“自由”的光环看清资本的罪恶本质。正如陈毅所言：“法国的工厂生活，是寄在资本主义制度的下面，不容工学者有发展的余地，尝感着一种迫我同化的压力。”又说：“当货物销路极广的时候，资本便雇过数的工人，以资制造。到销路低落时，便大批取缔出来。尝见工人被退出厂的情形，就是‘神情丧失’、‘面若死灰’都形容不尽致，令人表无限同情，觉社会革命是极合道理的事。……资本家完全为自己利益起见，实毫无人心，我才知道欧洲资本界是罪恶的渊藪。”^④

1921年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波澜迭起的多事之秋。因年前“歇工风潮”席卷欧洲，法国也呈现出原燃料匮乏，工商歇业，裁员成风，面包竟至数倍暴涨的一派惨景。这就使中国学生勤工、求学乃至生计都陷入困境。偏于此时来法者又蜂拥而至，1920年岁末总计已达1,600多人。其中，“已经作工的不到总数之1/4”，“近来冬季失掉工作的又几乎有作工数1/4”^⑤。当时有三、四百失工、辍学的勤工俭学生麇集于巴黎华侨协社，四川人又占其中多数。他们栖身于协社空屋、地窖及法国友人捐赠的帐篷，日以面包加自来水对付两餐。川生张侠逸就在此时死于病愤。正是在饥寒交迫中，留法勤工俭学生接连奋起抗争，四川学生则充当了斗争的骨干。

2月底发生了著名的“二八运动”。400多勤工俭学生涌向中国驻法公使馆进行“反饥饿”请愿，向北京政府要“生存权”和“求学权”，抗议蔡元培来法宣布华法教育会断绝与勤工俭学生的经济联系及公使陈篆扬言要把无工作的学生“遣送回国”。这次斗争的发动者和参与者，固然以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李富春等湖南学生为重要，但一般以赵世炎等其时坚持工读可行，不愿靠军阀政府施舍而反对请愿为由，忽视四川学生在运动中的巨大作用，却又显欠妥当。据当事者回忆，这次请愿前10天，即由留法勤工俭学生联合会的川籍代表李嘉秀草拟了致公使馆的请愿书。因使馆在所限3日不予答复，联合会才决定28日举行“反饥饿”运动。自21日起，李嘉秀、周泽厚、金满成、郭清正等四川同学即夜以继日地在协社开会，工作了七、八天，还印制了法文宣言书和致巴黎警厅公函。当时公使馆曾玩弄“釜底抽薪”之计，假手粤省郑毓秀女士借出2万法郎以“维持四川同学现状”，欲使占可能请愿者1/3以上的川籍学生退出请愿。然而28日那天，不仅住协社的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去的百余同学踊跃前往，而且才到巴黎两月的成都第二届同学大部分也参加了。就参与请愿的人数而言，四川仍居各省之冠，李嘉秀还是面见陈篆的10位发言人之一。当宪警袭来之际，四川学生英勇斗争，熊云章被殴扑地伤了手掌，陈光耀虽受重打，仍高呼“Vive L' Alle-

mand”不止（“德国人万岁！”意在讥讽法警只敢欺侮华人）。②这些事实可充分证实四川学生在“二八运动”中之积极作用。

6月初，北京政府为推行“武力统一”的内战政策，特派专使朱启铃、财政次长吴鼎昌到巴黎，在代表徐世昌总统前来接受巴黎大学所赠法学博士学位的名义掩护下，与法政府密洽借款和购买军火事宜。中旬，借款风声泄于报端。旅法学生经调查又得知：借款额为3亿法郎。其中7,500万法郎交北京政府，2,500万法郎为经手人之回扣，其余2亿存入法国经营的中法实业银行，俾免其倒闭。借款条件是以印花税、验契税作抵押，并出让滇渝铁路建筑权。消息传出，立即激起旅法华人公愤。如果说“二八运动”时赵世炎和蔡和森等旅法学生在是否请愿的问题上尚有分歧，那么反对北洋军阀出卖民族利益换取军火的斗争，却使他们迅速团结起来。赵世炎、陈毅会同周恩来、蔡和森等，6月30日在巴黎哲人厅召开了旅法各团体参加的“拒绝借款大会”。会议在赵世炎主持下，组建了“拒款委员会”，发表《拒款宣言》，在国内外造成拒款的巨大声势。8月13日，为抗议中法政府在7月25日草签借款合同并将借款额增至5亿法郎，赵世炎、陈毅、蔡和森、李立三等再度发起召开了有500多勤工俭学生和700多华工参加的“反对中法借款大会”。会上，李嘉秀和华工袁子贞等3人组成主席团，川生吴少海等还带头痛打代表陈策出席会议的公使馆一秘王曾思。在四川等省学生和华工的压力下，王被迫当场签字，表示尊重公意，承认中国无秘密借款之必要。③这两次拒款大会激起了海内外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的斗争浪潮，终使借款宣告流产。

拒款运动“妨碍了法国的远东利益，更影响了中法政界有关系人的升官发财的机会，在他们看来自然是罪无可恕”④。为施行报复，由中法官方人士合组之“留法中国青年学生监护会”在9月初宣布：从当月15日停发勤工俭学生的维持费。法外交部并扬言要把他们分批遣送回国。恰在此时，又传来原为解决勤工俭学生的求学问题而募款（包括法国所退庚款）筹建的里昂中法大学，已在国内另行招生，120多名新生将要抵达的消息。这就使饭碗既被打碎求学权利又被剥夺的勤工俭学生义愤填膺。他们当时除了直接进占里大已别无良方，便“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奋然去做。”四川学生充当了这场斗争的弄潮儿。早在5月，陈毅、刘伯坚、邓希贤（小平）和王若飞等243名旅法学生就曾联名致函陈策和蔡元培，敦请将里昂中国和中比大学改建为接纳勤工俭学生的工学院。9月19日，“占据里大先发队”从巴黎出发前，王若飞和李嘉秀又作为代表向陈策面陈同学们先入里大以待解决的情由和决心。“先发队”以川省陈毅、周泽厚和湖南蔡和森为领队，队员中四川学生有陈炎、王咸雄、周钦岳、夏时硕、黎纯一、金满成、周礼、林万选等20余人。随后赵世炎又率28位同学自克鲁邹赶到。“先发队”和各地同学共125人聚集在里大，公推赵世炎、陈毅、蔡和森等为交涉代表，赵世炎为总代表。当陈策等串通法国当局实行镇压，入占里大同学的护照尽被强缴，又被解入芒特吕克炮台兵营拘禁之际，李嘉秀等在巴黎奔走呼号，多方营救。聂荣臻则赶到里昂，利用领事所开通行证搭救出赵世炎等3人。随后赵世炎作为被扣学生的代表，也辗转于里昂巴黎间，作了大量交涉、营救的工作。被囚兵营的同学在陈毅、蔡和森等领导下，据理斗争，曾绝食一日，对“无辜受辱”以示抗议。10月13日，104名被拘学生被武装押解马赛，次日又被押进宝勒箭号轮船货仓强遣回国。其中，川籍同学有陈毅、陈炎、周泽厚、喻正衡、黎纯一等34人，为数又最多。他们含辱归国后，派出陈毅、黎纯一、喻正衡等代表，在京、沪、四川“陈述留法苦状”，争取生活与求学权利，大得舆论声援。⑤

争回里大运动还有涉及四川旅法学生的两起余波。一是斗争的积极参加者南充蒲照魂，因学友被逐深受刺激，且因劳碌过度肺部咯血，竟在病榻上以小刀戳腹自尽。^⑦二是郫县热血少年李鹤龄，里大斗争后志除陈篆，径到郑毓秀处作秘书。1922年3月21日，他乘陈篆往郑寓贺寿，对陈之汽车连发三枪，可惜未中陈本人。被执后他公开宣称：这是“为里昂中法大学被迫回国的勤工俭学同学报仇”，“只想为国家除去一专制人物耳”^⑧。这类极端作法不免幼稚和偏颇，它反映出一些旅法川生在未由马克思主义武装前政治上的不成熟。但是，它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四川留法勤工俭学生一般具有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群体意识，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忧国忧民，勇于舍身取义。恐怕这正是几番抗争他们参加者甚众而斗争也最坚决、最激烈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

艰苦的生活和严酷的斗争实践，成为留法勤工俭学生锻炼成长的熔炉。“勤工，苦工，至于苦工而不得；枵腹，露体，至于无有宿处；请求，呼号，反至触怒被囚；绝食，跳墙，乃至押送归国……”^⑨此种遭际是何等惨苦！然而，“劳动的真实的生活被他们尝着了；中法文化提携的假面具被他们识破了；社会现象的不平，东亚西欧如同一辙，也被他们发现了；纯洁的青年人格更从他们身上表现出来，这岂不是他们大有所得。”^⑩应该说这个“大有所得”便是留法勤工俭学生在磨难中开始了新的觉醒，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先进分子，而且在1921年的三大斗争后短短数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和“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就相继宣告诞生，谱写出留法勤工俭学生运动的崭新篇章。

1921年初，北京小组的张申府按陈独秀的委托，准备在留法生中建立党小组，他发展了天津刘清扬入党，随后又和刘介绍周恩来入党。3月，他们又和赵世炎及上海小组来的吴明（陈公培）沟通了关系，组成旅法共产主义小组。里大运动后，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统一的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为此，周恩来于1922年2月前往柏林，在留德学生中建立与发展共产主义组织。在里大斗争中失去护照，无法栖身都市，正在北法做清理战场苦工的赵世炎，也多次写信向旅居法、比、德的同志联络筹备。4月下旬，他还接连致函已返国的吴明和李立三：“关于青年团的事……亟待你们在国内的帮忙、接济并答复。”他在信中详细询问了国内青年团的情况，要求将党的重要文件、团章和团的印刷品尽速寄给他，并要团中央“指示应有的方略”。对团员的标准，他坚持“取极端严格手续”，同时又主张对够条件者“务求没有遗漏”。他看到一度信奉无政府主义的陈延年、陈乔年兄弟“近时倾向大变”，即欣喜地要求国内配合做工作，以使他们入团^⑪。经过紧张的筹备，1922年6月，由赵世炎主持，“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正式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宣告成立。与会代表共18人，除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李富春等外，还有刘伯坚、萧朴生、傅钟等川籍青年。赵世炎被选为书记，周恩来担任宣传，李维汉担任组织。不久赵世炎、王若飞、陈氏昆仲和萧三等5名党员，又经阮爱国（胡志明）介绍入法共。旅欧“少共”因而加强了和法共的关系。翌年2月，旅欧“少共”又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决定按中共中央指示，正式改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因赵世炎即将赴苏学习，会议选举周恩来为书记，萧朴生、刘伯坚等为委员。当时旅欧团员约70多人，分旅法、旅德、旅比三个支

部，川籍团员在其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先后任总支书记的，除赵世炎外，还有刘伯坚（第三届）和傅钟（第五届）。在旅法支部负过责的，有萧朴生、傅钟、邓小平、杨伯恺、李大章、雷定琨、任卓宣（叶青）等；在旅比支部负过责的，有刘伯坚、聂荣臻、江克明、毛德成等。以后团员增至300多人，川籍团员仍占很大比例，象成都第二届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由萧朴生、程秉渊（子健）、穆清、黄里州等13人组织的“劳人团”，后来除1人外，全都入了团，并转为中共党员。据不完全统计，四川留法勤工俭学生入团者，总计在百人以上。^②

川籍团员在旅欧总支部的领导下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革命工作。例如为对外宣传，总支部出版了《赤光》周刊以代替原来的《少年》半月刊，《赤光》的封面就是四川周权设计并制的版。赵世炎、刘伯坚、傅钟、邓小平、萧朴生等为刊物写过很多关于马列主义和时事评论的文章，对提高旅法同学和华工的政治觉悟有很大影响。当时年纪最小的邓小平还参加了《赤光》的编辑出版，专管刻印，他的字工整秀丽，印刷清晰，简直和铅字不相上下，因此被誉为“油印博士”。为了把华工的斗争引上正确的轨道，总支部专门建立了萧朴生为主任的华工运动委员会，组织团员深入华工举办夜校、识字班、工人俱乐部，协助华工中的先进分子瓦解行会和帮派，建立了统一的华工总会，并出版《华工旬报》，系统地对华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阶级教育，向他们灌输马克思主义，使一批优秀华工入党入团，走上了革命道路^③。川籍团员还积极批驳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少共”成立前后，为批判吴稚晖、李石曾等曾鼓吹的无政府主义，赵世炎在《少年》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并和无政府主义者办的《工余》展开激烈论战。他还为争取陈氏兄弟转奉共产主义费了不少心血。1923年以后，聂荣臻、刘伯坚、萧朴生、许肇樞等又参加了对旅法川生中的反动分子曾琦、李璜、何鲁之等为头子的国家主义派的批判，“主要是在《赤光》上写文章揭露他们的反动观点，有时就开会面对面地辩论^④”。象许肇樞就在《赤光》上例举大量证据确凿的事实，揭露国家主义派组成的青年党“和教徒、军阀、帝国主义全是‘一丘之貉’”。淋漓尽致地痛斥他们是“反革命”和“军阀的走狗”^⑤。另外，在1923年旅法华人反对列强阴谋“共管”中国铁路的斗争中，在1924年底反对皖系军阀徐树铮代表段祺瑞政府赴法大借款的斗争中，在1925年6月声援国内“五卅”运动的斗争中，川籍团员也都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6月斗争后，因青年党告密，李大章、雷定琨、金百鎔等还被法国警方逮捕，强驱出境。他们在致旅法华人的留别书中说：“我们虽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反革命派之陷害，但决不因此灰心，且将倍加奋发尽全力以打倒他们”。“起来！战！战！战！”^⑥

由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还有不少川籍党团员由法国、德国和比利时转赴苏俄，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从1923年底到1926年初，陆续去俄的有赵世炎、刘伯坚、聂荣臻、钟汝梅、冉钧、穆清、邓小平、傅钟、陈家珍、王极知、许肇樞、许祖熊、周文楷、李鹤龄等数十人。他们终于实现了前往十月革命的故乡学习考察的宿愿。

川籍留法勤工俭学生不但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们的学业完成亦是成绩斐然。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在格累诺布耳大学、三太田矿业专门学校、梭米耳工业学校、密鲁士及鲁贝高等纺织学校、巴黎大学、锡南大学、里尔工学院及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毕业的，就有200余人^⑦。不少人还获得了博士、硕士、工程师等学位和称号。当然，其中有些人一直不与闻社会活动和政治斗争，沉溺于埋头苦读。他们不是社会制度大变革的斗士，

日后则成为学有专长的学者、作家和工程师，也曾以己一技之长报效国家和社会。他们在学业上的成就，却证明了中国人、四川人的聪明才智并不比外国人差。至于青年党的曾琦、李璜、何鲁之者流，以及最终沦为革命叛徒的叶青，他们是旅法川生的败类，他们的恶名玷污不了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主流。

我们为之自豪的是，在中国革命峥嵘而漫长的岁月中，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四川籍共产主义战士，艰难创业，矢勤矢忠，不少人成为党和国家的杰出领袖，为祖国和人民鞠躬尽瘁，无私地奉献出自己毕生的精力。更多的则在革命征途壮烈捐躯，血沃中华。他们代表着留法勤工俭学的主流和正确方向。他们的英名和光辉业绩将史册永垂。他们永不满足于追求真理，一片丹心爱国、为国、报国的崇高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后继者景仰和发扬。

注 释：

- ①②③④ 恩来《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命运》载天津《益世报》1920年12月18日—1922年1月9日。
- ②《总署复议遴选生徒游学日本事宜折》转引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料》上册173页。
- ③《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17页。
- ④《新青年》三卷三，1917年5月1日。
- ⑤⑬⑭⑮⑯ 黄里州《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
- ⑥王笛《清末四川留日学生述概》《四川大学学报》1987年3期。
- ⑦参阅《旅欧教育》49—50页；《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一）上海1980年版8页；《吴玉章回忆录》107页；黄里州前文。
- ⑧《留法俭学会发起人公启》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一）上海版11页。
- ⑨《旅欧杂志》第24、25期“通讯栏”1917年10—11月。
- ⑩⑪《国民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1月7日。
- ⑫⑲⑳㉑ 聂荣臻回忆录》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8页、20页、26—27页、32页。
- ⑬王光祈《工读互助团》载《少年中国》一卷七期，1920年1月5日。
- ⑮崔宗复《张澜先生年谱》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54—55页；《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上海版444页。
- 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上海版92页、212—213页；《聂荣臻回忆录》10页。
- ⑰《时事新报》1921年12月2日；黄里州前文。
- ⑱黄里州文；徐特立《法国化学厂之中国苦学生》载《时事新报》1920年3月5日；王若飞《圣夏门勤工日记》，载《少年世界》1920年6月。
- ⑲鸿才《留法勤工俭学生之近况》，《申报》1921年3月30日。
- ⑳陈毅《我两年来旅法勤工俭学的实感》，《晨报》1921年8月17—19日。
- ㉑赵世炎、王良翰、李隆郅等22人《留法俭学生对华法教育会之要求》《晨报》1921年3月13日。
- ㉒参阅周恩来《旅欧通信》人民日报出版社1979年版127—141页；澹庐《巴黎拒款大会》，《时事新报》1921年8月14日；黄里州前文。
- ㉓清华大学党史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2）下，519—671页；《聂荣臻回忆录》24页；黄里州前文《赵世炎生平史料》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23辑。
- ㉔《晨报》1922年1月6月。
- ㉕《时报》1922年5月5日；《晨报》1922年5月16日；黄里州前文；李季伟《留法勤工俭学亲历记》

（下转第84页）